

反思“军国主义”

【摘要】二战后，德国对于自己的军国主义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通过消除军国主义的地缘政治基础和营造根除军国主义的政治文化环境两方面的努力，对军国主义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清算。这与日本战后的表现很是不同，并获得了世界各国的尊重。对于今天我们警惕军国主义仍有很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军国主义 地缘政治 文化环境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德国反思军国主义的当前启示

田德文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战败国，德国和日本战后的表现很是不同。德国对军国主义历史进行了深入反省，已经重新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而日本右派至今不肯正视当年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侵略战争的反人类行径，不断以言语或行动冒犯受害国人民感情，搞得自己到处遭人谴责、鄙视，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形成这种差别，主要原因是德国和日本所处的外部地缘政治格局和内部政治文化变化有很大不同。

消除军国主义的地缘政治基础，从根本上杜绝了德国重归军国主义老路的可能性

德国的军国主义传统是在其建

国过程中形成的，是当时欧洲地缘政治的产物。德国和法国作为欧洲大陆上两个实力最强的国家，历史上不断打仗，结下深仇大恨。两次世界大战都与德法世仇有关，给欧洲乃至世界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二战结束后，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根本变化，最终清除了德国军国主义的存在基础。因此，战后德国反思军国主义绝不仅仅是一个思想上的过程，更是地缘政治格局客观变化的结果。

历史上看，可以说没有军国主义就没有德国。德意志国家起源于公元911年东法兰克王国康拉德一世当选国王的时候。但是，此后“德意志”只是由大小不等的邦国组成的松散的“文化共同体”，政治和经济上长期分裂，形态类似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将这些邦国统一起来，没有强大的军力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当时的欧洲强国，尤其是法国，也不希望德意志走向统一。正是在这种地缘政治背景下，德意志统一的历史使命最后才落到军力最强的德意志邦国普鲁士身上。普鲁士地处德意志东部边境。1618年，德意志东部以柏林为中心的小邦勃兰登堡通过联姻和称臣的方式，取得波兰王国的领地普鲁士公国。三十年战争后，普鲁士公国内部很多贵族继续效忠波兰国王，对抗德意志王室，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决定建立了一支直接听命于国王的强大军队。到1740-1786年佛里德里希二世任国王时期，普鲁士军队已经多达20万人。由于继承了条顿



特别策划 Specials

骑士团的军事专制传统，这支军队的作战能力很强，使得普鲁士成为欧洲的军事大国，最终横扫不愿统一的德意志各邦国，以及法国、丹麦、奥地利等邻国，完成了德意志建国大业。

德国军国主义传统的不断强化，与建国过程中普鲁士与法国的结下深仇大恨分不开。对这两个国家来说，谁战败谁就蒙羞受辱、任人宰割，因此必须不断扩军备战。1795年，普鲁士败于法国，被迫割让莱茵河以西领土。1806年，普鲁士再次败于法国，失去16万平方公里土地，赔款1.3亿法郎。1815年，普鲁士在滑铁卢击败法国，终止了拿破仑横扫欧洲的势头。1870年，普鲁士再败法国。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镜厅登基，宣布建立德意志帝国。到敌国王宫里建国，这应该是国家间羞辱的极限了。不过，法国人其实也没啥可抱怨的，因为他们作为战胜国的时候也没少羞辱普鲁士。1806年拿破仑攻入柏林，就曾下令把勃兰登堡门上的女神和驯马战车雕像作为战利品拉回巴黎。20世纪后，德法之间的仇恨不断累积。1919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被迫回到凡尔赛宫来签署割地赔款、限制军力的“和约”。其中，德国需要支付的赔款额高达1320亿马克，直到2010年才赔完。从这种角度说，纳粹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有着“雪耻”和“复仇”的色彩。1940年，法国向纳粹德国投降。希特勒刻意把签字仪式放在贡比涅森林雷道车

站的福煦车厢进行，因为1918年德国战败后就是在那里签署的停战协定。

二战结束后，形成德意志军国主义的地缘政治基础发生根本变化。一方面，德国战败后被盟军占领，随后分裂为西德和东德两个部分，彻底失去了形成“军国”的能力。另一方面，战胜国也没有进一步羞辱、孤立德国。冷战过程中，1954年西德加入北约，成为西方“集体安全”机制的组成部分。次年，东德加入苏联主导的华约集团。也就是说，战后10年，两个德国在军事上都已得到其他国家的接纳，既不可能，也没必要重建独立的强大武装。更重要的是，战后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都认识到消除两国世仇的必要性。1951年，按照法国提出的“舒曼计划”，法国和西德将煤炭、钢铁生产交由一个共同机构管理，建立“欧洲煤钢联营”，基本消除了两国重新备战的可能性。1958年，以德法为核心的西欧六国签署“罗马条约”，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联营”，全面启动欧洲一体化进程。这种变化使德国和法国在经济上实现高度整合，真正建成“命运共同体”，从根本上杜绝了德国重归军国主义老路的可能性。

营造根除军国主义的政治文化环境

数百年的军国主义历史对德国社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与西欧其他国家相比，历史上建立在“普鲁士精神”基础上的德意志文化中的“父权主义”色彩非常浓厚，在

价值观上更加强调勇敢、严谨、服从、纪律、秩序等“自律性”而非“自由性”的品质。同时，历史上很多德国人都存在种族优越感，认为德意志民族比其他种族更加优秀。毋庸讳言，这种社会文化在纳粹兴起的過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希特勒充分利用了一战后德国人的屈辱感，对魏玛共和国时期贫穷、动荡的不满，尤其是德国社会中下层广泛存在的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情绪。按照德国人的心理诉求，希特勒带来了安全、稳定与繁荣，代价是把德国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监狱，最终经由战争走向毁灭。

战后初期，很多德国人并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引以为豪的“德意志精神”养育了纳粹主义这个反人类的恶魔。他们不愿意承认“普通”德国人在战争中犯有“集体过错”，私下里不乏关于纳粹、战争和占领的错误言论。根据1951年西德“131法案”，不少前纳粹文职人员仍在政府就职。阿登纳政府的国务秘书戈罗布克就曾参与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的起草工作。直到1960年代末学生运动兴起，西德才开始逐步清理前纳粹官员。在左派学生运动推动下，1969年出任西德总理的社民党人勃兰特开始推行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解的“东方政策”。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在华沙代表西德与波兰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在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双膝下跪，代表德国向纳粹受害者谢罪，此举对于在西德营造以纳粹历史为耻的社会氛围起到重要作用。



1970年12月7日，时任德国总理勃兰特向德国二战无辜杀害的犹太人下跪谢罪 新华社发

在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过程中，杂音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应该如何看待战争给德国人带来的灾难？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胜利日，对德国人来说是不是战败日、灾难日？2002年，德国历史学家约格·弗里德里希在《大火》一书中详细叙述了二战期间盟军对德国城市的空袭，将其与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相提并论。第二，德国的“普通人”在战争有没有罪责？1990年代初，美国历史学家戈德哈根出版专著《希特勒心甘情愿的刽子手——大屠杀中的普通德国人》，对纳粹时期参加大屠杀的德国协警进行专题研究，结论是纳粹时期普通德国人都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帮凶。该书出版后在德国引发争议，不少人以各种说辞进行辩驳。第三，德国对纳粹历史的“赎罪”是否已经结束？1986年，西德历史学家诺尔特在一篇文章中抱怨：纳粹德国已经灭亡40年，这段历史怎么还不能“过去”？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并非独一无二，其他国家也曾发生

过类似事件。

在德国，这些杂音并不可怕，因为德国政府和公众在否定纳粹历史方面已经形成坚定的主流立场。一方面，战后德国在赎罪问题上态度鲜明。1951年，西德总理阿登纳表示：“赔偿是我们的责任，它虽然不能洗刷我们的罪恶感，却是和解的前提。”根据1965年《联邦赔偿法》的规定，据估计德国已向纳粹时期因种族、宗教、出身和意识形态等原因受到迫害的个人特别是犹太人支付了总计为784亿马克的赔偿。1999年6月，德国众议院决定在柏林建造纪念碑，悼念在纳粹大屠杀中遇害的犹太人，警示国人牢记纳粹时期的罪恶；另一方面，战后德国在遏制国内“新纳粹”势力兴起方面态度坚决。按照德国法律，任何针对纳粹标志的崇拜都是违法行为。2000年，德国警方突袭一场新纳粹音乐会，逮捕32名乐队成员。2013年，德国警方破获一个名为“国家社会地下组织”的新纳粹暴力团体，主犯可能被判终身监禁。

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德国民众在反纳粹方面已经形成坚定的共识，成规模的新纳粹主义公开活动都会遭到广泛的抵制。2014年11月，新纳粹分子在柏林示威，抗议政府为外来难民提供避难所。活动遭到3000多名反对极右势力的市民的阻拦，双方发生暴力冲突。正因如此，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如“国家民主党”、“共和党”和“德国人民联盟”等，在各类选举中就几乎从未取得过值得一提的胜利。而在欧洲其他国家，包括法国、荷兰、意大利，此类政党都会得到更多民众的支持。反思战后德国根除军国主义的过程，民众在否定纳粹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极端主义方面形成坚定的主流立场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人民论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著），贾宗谊（译）：《希特勒的志愿行者》，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

责编/高骊 申唯佳（见习） 美编/李祥峰